

· 国际贸易 ·

从要素红利到生产力红利

——新质生产力对外资吸引力的重塑机制

戴翔, 任祎婕, 成鹏东

(南京审计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 如何突破传统要素红利消退的瓶颈以实现利用外资稳增长, 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立足于新质生产力理论, 构建包含“要素升级、空间重构、绿色转型”的分析框架, 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驱动外资稳规模、扩增量的微观机理。本文利用2006—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自主构建的新质生产力指数,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外资吸引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发现: 新质生产力能够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 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吸引外资的两条关键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梯度差异和环境门槛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仅发生在东部地区; 且该效应高度依赖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制度型环境的协同支撑, 仅在高水平环境下得以充分释放。本文结论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资演进规律提供了新视角, 并为构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高质量引资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稳外资; 技术创新; 绿色转型

中图分类号: F12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26)04-0103-15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历史性交汇,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严峻挑战: 传统要素驱动的增长动能日益减弱,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瓶颈亟待突破, 国际经贸秩序的深刻调整推动开放型经济加快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理论为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该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生产力变革的内在规律, 强调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收稿日期: 2025-05-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统计监测评价问题研究”(23&ZD036);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制度—政策—生态’三元视角下政府协同治理影响江苏民营企业创新的机制效应与路径研究”(25ZHB007)

作者简介: 戴翔 (1980-), 男, 安徽合肥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 aufedx@163.com

任祎婕 (2001-), 女, 山西晋中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 yijie_r@163.com

成鹏东 (1997-), 男, 陕西铜川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机器学习与经济统计分析研究。E-mail: nscpd@163.com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其核心在于强化创新驱动,重塑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并加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贯彻落实新质生产力理论,要求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为应对新形势,202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外商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稳定存量、拓展增量的务实举措。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要素竞争优势的相对减弱^[1],叠加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盛行,跨国投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上述挑战和政策导向,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核心问题亟待解答: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何成为实现稳外资目标的关键路径?回答这一问题,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揭示新质生产力与稳外资的互动机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变革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差异化的政策组合,助力其突破“低端锁定”困境,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该命题至关重要,但鲜有研究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系统探讨稳外资问题。现有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多聚焦于其内涵界定^[2-5]、功能阐释^[6-7]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促进作用^[8-11],缺乏对新质生产力稳外资效应的考察,导致理论供给滞后于实践需求。

为厘清这一研究缺口,有必要梳理现有关于稳外资影响因素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一是营商环境因素^[12]。研究表明,母国税费优惠政策会引发跨国公司资金回流^[13-14],而东道国税收营商环境的优化则有助于稳外资^[15]。此外,贸易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制造业外资的流入规模^[16-19],如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关税冲击加剧了外商撤资^[20]。二是全球供应链因素。洪俊杰等^[21]认为,由中间品供给收缩引发的国际供应链冲击对外资流入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三是成本效益因素。具体而言,工业用地成本上升^[22]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器换人”效应^[23-24]降低了外企投资意愿;数字经济发展^[25]和国内工业机器人应用^[26]则能有效稳外资。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虽为理解外资流动提供了有益视角,但在解释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稳外资问题时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是研究范式呈现“碎片化”特征。既有研究或聚焦于传统要素禀赋衰减的单一效应问题^[27-30],或侧重于特定政策工具的短期影响,缺乏对“技术驱动下的绿色转型”这一协同机制的系统剖析,难以全面阐释外资流动的新逻辑。二是理论构建呈现“表层化”倾向。多数研究将新质生产力视为静态、同质的概念,忽视了其内部“技术跃迁、结构升级、制度创新”的动态演化过程。三是政策建议受限于“工具理性”局限。现有研究多停留于产业政策调整层面,未能深入探究生产关系调整和治理体系创新等深层次问题。

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双重路径,增强中国吸引和稳外资的综合能力,力求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理论突破。一是针对“碎片化”问题,构建系统的三维分析框架。本文突破传统生产力研究中要素决定论的局限,构建涵盖“要素升级、空间重构、绿色转型”的三重传导路径,揭示新质生产力如何借由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内生地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二是针对“表层化”问题,深化战略层面的理论阐释。本文将稳外资问题置于国家竞争优势重构的战略背景下,超越微观层面的单一视角,探索新质生产力培育与高质量利用外资之间的协同演进路径。三是在实证测度和方法上实现创新。本文将传统生产要素细化为数字化劳动力、数据资本、物质资本和传统劳动力四大核心要素,科学测度各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以期为准评估其对稳外资的贡献提供新的测度工具和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新质生产力稳外资的内在机制,本质上是生产力系统变革与资本要素配置的动态适配过程。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具有追逐先进生产力的内在属性,其流动方向取决于生产要素质量与技术创新速度的匹配程度。在传统要素驱动阶段,要素红利和资源禀赋曾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30]。然而,随着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资本流动逐渐转向技术、数据和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1]。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要素质量与优化结构^[31],重塑了资本流动的吸引力结构,进而形成“要素升级、空间重构、绿色转型”的三重传导路径。具体而言,要素升级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外商投资的回报预期;空间重构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提升价值链位势拓展外资发展空间;绿色转型则通过契合全球绿色投资趋势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三者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影响外资流入和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升级、空间重构和绿色转型显著增强了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进而在全球资本流动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发挥出关键的稳外资效应。

第一,新型要素的集聚与升级是重塑外资吸引力的核心基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要素升级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技能的跃迁^[32]和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迭代。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演进,社会对新型技能的需求日益增长,劳动力技能跃迁进程明显加快。这一需求驱动劳动力市场发生显著变革,就业结构从依赖简单操作性岗位逐渐向复杂创新型岗位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深刻重塑,更彰显了劳动力素质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精准适配。显然,劳动力技能的跃迁显著增强了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尤其是大幅提升了针对高技术、人才密集型优质外资的磁吸效应^[33]。

在劳动资料智能化迭代维度,数字技术的飞跃加速了生产设备向智能化、服务化转型,进而构筑起独特的技术嵌入式外资“引力场”。随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外资企业得以与中国供应链数据实现深度互联互通,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推动了“数字孪生”技术在生产优化中的落地应用。该技术通过数字模型对生产全流程进行模拟与分析,实现了流程优化、能耗降低与产品质量提升的“三重增效”。此外,该技术还为外资企业管理在华业务提供了更灵活、高效的数字化支撑,进一步夯实了其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与投资意愿。

第二,空间重构开辟了外资发展的新天地,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培育与高质量外资利用的协同发展,进而构建起利用外资的新“引力场”,发挥稳外资的关键作用。具体而言,空间重构主要体现为价值链位势的攀升、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和制度型开放带来的制度空间拓展。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推动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助力外资深度融入高附加值环节。在此过程中,外资企业不仅共享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广阔市场机遇^[34],还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助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了产业链的完善与优化,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营造了更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因此,新质生产力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稳外资、促开放的关键力量。

在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方面,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共同体。该模式深化了多方主体的合作与交流,打造了外资深度参与的创新生态圈。这一协同机制不仅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还显著提升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磁吸力与核心竞争力。依托该协同创新共同体,外资企业能高效对接前沿技术信息和研发资源,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深化联合研发,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该协同创新共同体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的契机,助力其在中国业务长期稳定发展。

就制度型开放拓展空间而言,既有研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35]。制度型开放正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必由之路^[36]。

其中,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准入制度与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举措,共同构成了保障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框架。该制度保障不仅营造了公平透明的运营环境,更通过界定市场准入边界,夯实了外资在华投资的信心与预期。

第三,要素升级与空间重构的深度耦合有助于重塑利用外资新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要素升级与空间重构并非独立发挥作用,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究其本质,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源于要素质量提升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双向赋能与动态适配。要素升级通过技术扩散提升外资边际生产率,空间重构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制度红利,两者共同形成“生产率提升—成本下降”的良性循环。这种协同效应强化了中国在全球资本配置中的“磁场效应”,从而解释了为何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周期性调整与结构性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利用外资仍能保持强劲韧性与增长态势。

进一步看,要素升级不仅局限于技术改进,更涵盖管理创新、服务优化和人才赋能等多维度的跃升,为外资企业营造了更高效的运营环境,进而提升整体生产效能。与此同时,空间重构体现为资源的重新配置与优化,既包括物理空间重组,也涵盖虚拟空间整合,如利用数字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市场透明度。二者的协同作用产生了强大的外资吸引力,不仅引致更多外资流入,还促进了外资企业间的良性竞争,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这种正向循环稳固了中国在全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使其即便面对全球经济波动,仍能保持外资流入的稳定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 新质生产力能够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

事实上,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全面跃升为内涵,而其要素升级本质上植根于技术创新。换言之,无论是劳动力技能跃迁、劳动资料智能化迭代,还是劳动对象的生态化拓展,均依赖于技术创新这一根本动力。因此,无论是吸引外资新优势的构建,还是外资发展新空间的重构,本质上皆源于技术创新的驱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a: 新质生产力通过激发技术创新活力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

如果说技术创新构筑了吸引外资的新优势,那么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绿色属性^[7]及其推动的产业绿色化转型^[6],则精准契合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向绿色领域流动的新趋势,从而拓展了中国吸引外资的空间新优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4》显示,绿色产业已持续占据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核心领域。在生产力要素维度上,绿色转型重塑外资吸引力的机制主要体现为劳动对象的绿色化重构。

具体而言,这种绿色化重构集中体现为原材料体系的低碳化变革^[32]。“双碳”战略倒逼原材料体系加速转型,这不仅激发了绿色技术投资需求,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外资企业通过积极适应绿色规制,如建立碳足迹追溯体系等,抢占市场先发优势,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劳动对象的绿色化重构深度契合外资企业的投资诉求,为其在华长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绿色动能。这种绿色化重构不仅回应了外资企业对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更实现了与中国绿色经济战略的同频共振,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孕育了新机遇。展望未来,随着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绿色技术持续创新,外资企业将更深入地融入中国绿色低碳转型进程,进而形成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b: 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绿色转型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FI), 作为衡量区域对外资吸引力的代理变量。该指标的选取不仅需要能够反映外商投资规模的动态变化, 还需要兼顾外资进入的深度与广度。鉴于此, 本文选取各省份外资企业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2. 解释变量^①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水平 (NQ)。既有研究对新质生产力的测度多基于其理论内涵展开: 部分研究依据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实体要素构建测算体系^[37]; 部分研究则从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新形态建立评价指标^[38]。科学测度新质生产力, 既要涵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实体要素的转型升级, 也需纳入新技术、生产组织优化和数据要素等渗透性要素的驱动效应^[39]。

据此, 为有效识别“新质”成分, 本文将生产要素细分为数字化劳动力、数据资本、物质资本和传统劳动力, 旨在反映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产要素的分化趋势和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变。本文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 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新质”成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以准确评估新质生产力水平。

第一步, 计算数字化劳动力。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测算人力资本存量, 从劳动力质量维度构建人力资本存量 L , 即总体人力资本规模:

$$L = 6H_1 + 9H_2 + 12H_3 + 15H_4 + 16H_5 + 19H_6 \quad (1)$$

其中, H_j ($j=1, 2, \dots, 6$) 分别为小学、初中、高中 (含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占该省份总就业人员的比重, 系数 6、9、12、15、16、19 分别为对应学历层次的标准受教育年限。

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人力资本存量作为总体规模指标, 并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结构分解系数。具体而言, 以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40] 衡量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权重, 记为 $share_{digital}$ 。据此, 本文利用该权重对总体人力资本规模进行比例剥离, 进而估算数字化劳动力 L' , 计算公式为:

$$L' = L \times share_{digital} \quad (2)$$

第二步, 计算数据资本。借鉴许宪春等^[41] 的方法, 本文基于成本法测度数据产出价值 C :

$$C = \sum_{i=1}^T [1 + \varepsilon_i + \beta_i + (1 + \varepsilon_i + \beta_i)\gamma_i] W_i \quad (3)$$

其中, T 为行业个数, W_i 为行业 i 数据相关活动获得的劳动报酬总额, ε_i 为数据相关固定资本成本与数据相关劳动力成本的比例系数, β_i 为数据相关中间消耗与数据相关劳动力成本的比例系数, γ_i 为数据相关营业盈余净额。

在得到数据产出价值的基础上, 剔除重复核算部分和小农户劳动报酬, 仅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数据计入资产, 进而得到数据资本形成总额 A 。由于缺乏直接统计数据, 借鉴 Calderón 和 Rassier^[42] 的研究, 本文将数据产出中可资产化的比例设定为 50%。

在获得各期数据资本形成总额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数据资本存量 K' :

$$K'_{t+1} = K'_t(1 - \delta_t) + A_t \quad (4)$$

其中, K'_t 为一省在第 t 年的数据资本存量, δ_t 为数据资本折旧率, A_t 为一省在第 t 年的数据资本形成总额。借鉴张军等^[43] 的研究, 初始数据资本存量 K'_0 通过资本形成总额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推, 计算公式为:

$$K'_0 = \frac{I_0}{g_A + \delta_1} \quad (5)$$

其中, I_0 为基期数据资本形成总额, δ_1 为数据资本折旧率, g_A 为数据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增

①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完整测度过程未在正文中列出, 留存备索。

长率。

第三步, 计算物质资本。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测度物质资本。具体而言, 通过以下递推公式逐年计算物质资本存量 K^* :

$$K_{t+1}^* = K_t^*(1 - \delta_2) + B_t \quad (6)$$

其中, K_t^* 为某省份在第 t 年的物质资本存量, δ_2 为物质资本折旧率, B_t 为某省份在第 t 年的物质资本形成总额。

第四步, 计算传统劳动力。本文以人力资本总体存量为基准, 通过从劳动力总规模 L 中扣除上述剥离的数字化劳动力 L' , 所得余项即界定为传统劳动力 L^* :

$$L^* = L(1 - share_{digital}) \quad (7)$$

第五步, 计算新质生产力水平。本文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作为最终产出变量, 构建以下投入产出模型:

$$GDP = f(L', K', K^*, L^*) \quad (8)$$

本文构建如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以各省第 t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_t 为被解释变量, 考察数字化劳动力 L' 、数据资本 K' 、物质资本存量 K^* 、传统劳动力 L^*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n GDP_t = \alpha_0 + \underbrace{\alpha_1 \ln L'_t + \alpha_2 \ln K'_t}_{\text{“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贡献}} + \alpha_3 \ln K_t^* + \alpha_4 \ln L_t^* + \underbrace{\frac{1}{2} \beta_{11} (\ln L'_t)^2 + \frac{1}{2} \beta_{22} (\ln K'_t)^2 + \frac{1}{2} \beta_{33} (\ln K_t^*)^2 + \frac{1}{2} \beta_{44} (\ln L_t^*)^2}_{\text{“新质”成分的拓展贡献}} + \underbrace{\beta_{12} \ln L'_t \ln K'_t + \beta_{13} \ln L'_t \ln K_t^* + \beta_{24} \ln K'_t \ln L_t^* + \beta_{34} \ln K_t^* \ln L_t^*}_{\text{“新质”成分的调节贡献}} + \varepsilon_{mt} \quad (9)$$

其中, α_m 为各要素的一阶弹性系数; β_{mm} 为二次项系数, 反映要素边际报酬变化; β_{mn} 为交叉项系数, 反映要素间替代或互补关系。所有变量均经价格平减并取自然对数。 α_0 为截距项; ε_{mt} 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此模型, 本文进一步计算“新质”成分, 即 L'_t 与 K'_t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NQ , 以衡量其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

$$NQ = \alpha_1 \ln L'_t + \alpha_2 \ln K'_t + \frac{1}{2} \beta_{11} (\ln L'_t)^2 + \frac{1}{2} \beta_{22} (\ln K'_t)^2 + \beta_{12} \ln L'_t \ln K'_t \quad (10)$$

需要注意的是, 式 (10) 计算的数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边际贡献, 而是数字化劳动力和数据资本在超越对数函数中所占的解释权重。

3. 机制变量

技术创新活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 其发展水平主要表征为各省份的创新产出效能。鉴于此, 本文采用各省份发明专利数 ($TI1$) 和技术市场成交额 ($TI2$) 作为衡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 并对数据取自然对数, 以减弱异方差性。

关于绿色转型的测度, 本文构建双重指标体系, 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借鉴曹薇等^[44]的研究,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 2006—2022 年各省份低碳发展指数 ($lowcarbon1$), 该指标数值越大, 代表低碳发展水平越高。为进一步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并克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 本文基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测算各省份碳排放强度 ($lowcarbon2$), 该指标数值越大, 代表碳排放强度越高, 即低碳发展水平越低。

4. 控制变量

借鉴方慧等^[45]、戴翔和马皓巍^[46]的研究, 本文选取以下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 所有货币指标均以 2006 年为基期进行价格平减处理。

交通基础设施 ($Road$): 采用各省份公路里程数的自然对数衡量, 反映物流通达能力。经济发展水平 ($Development$): 采用各省份人均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 反映宏观经济规

模效应。劳动力成本 (*Wage*): 采用各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衡量, 反映要素成本压力。产业结构 (*Sector*): 采用各省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 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财政自给率 (*Fiscal*): 采用各省份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内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衡量, 反映地方政府依靠自有财政收入满足公共支出需求的能力。

(二)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FI_{pt} = \xi_0 + \xi_1 NQ_{pt} + \nu Control_{pt} + \mu_p + \lambda_t + \varepsilon_{pt} \quad (11)$$

其中, p 为省份, t 为年份, FI_{pt} 为 p 省份在第 t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经 CPI 平减至 2006 年不变价), NQ_{pt} 为 p 省份在第 t 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Control_{pt}$ 为上述控制变量, μ_p 为省份固定效应, 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pt} 为随机误差项。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覆盖 2006—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 (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 共计 510 个观测值。外商投资数据及机制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中国统计年鉴》; 新质生产力测算所需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此外, 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的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值较低 (0.143), 但离散度高, 标准差为 0.315, 最大值达 3.814, 这表明外资分布高度集聚; 新质生产力水平均值为 0.635、中位数为 0.547, 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略呈左偏, 反映区域间发展不均衡, 但具备提升潜力。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i>FI</i>	510	0.143	0.315	0.002	0.042	3.814
新质生产力水平	<i>NQ</i>	510	0.635	0.430	0.185	0.547	2.833
发明专利数	<i>TI1</i>	510	5.538	10.192	0.010	2.013	87.221
技术市场成交额	<i>TI2</i>	510	0.430	0.928	0.001	0.080	7.948
低碳发展指数	<i>lowcarbon1</i>	510	2.128	1.489	0.174	1.681	10.060
碳排放强度	<i>lowcarbon2</i>	510	0.323	0.236	0.032	0.238	1.173
交通基础设施	<i>Road</i>	510	14.549	7.923	1.040	14.755	40.540
经济发展水平	<i>Development</i>	510	9.582	1.000	6.372	9.656	11.772
劳动力成本	<i>Wage</i>	510	10.839	0.549	9.640	10.885	12.267
产业结构	<i>Sector</i>	510	0.476	0.094	0.298	0.468	0.838
财政自给率	<i>Fiscal</i>	510	0.499	0.193	0.148	0.449	0.95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2 汇报了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 (1) 为不含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的初步估计结果, 列 (2) 引入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列 (3) 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新质生产力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 这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稳定外资流入具有积极作用。根据列 (3) 的结果, 新质生产力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增加 0.228 个单位, 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增强了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 假说 1 得到验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NQ</i>	0.267** (0.099)	0.283*** (0.089)	0.228*** (0.073)
<i>Road</i>			-0.025 (0.018)
<i>Development</i>			0.395 (0.335)
<i>Wage</i>			0.794* (0.438)
<i>Sector</i>			2.568* (1.317)
<i>Fiscal</i>			-0.820** (0.349)
省份/年份FE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027 (0.047)	-0.037 (0.057)	-12.835* (7.296)
样本量	510	510	510
\bar{R}^2	0.133	0.440	0.48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内生性检验

尽管前文基准回归初步证实了新质生产力对外资流入的促进效应，但模型仍可能面临双向因果引致的反向因果偏误及遗漏变量问题。为有效缓解内生性干扰并识别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表3报告了内生性检验结果。

借鉴黄群慧等^[47]、赵涛等^[48]的研究，本文构建两个工具变量。*inter1*为1984年各省份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年度总量）的交互项。*inter2*为1984年各省份邮局数与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年度总量）的交互项。选取上述工具变量的逻辑在于：历史上通信设施完善的地区，其数字技术积淀通常更深，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同时，1984年的通信设施禀赋属于前定变量，早于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时期，不太可能通过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渠道直接影响当期外资决策，从而满足外生性要求。

表3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i>NQ</i>	<i>FI</i>	<i>NQ</i>	<i>FI</i>
<i>inter1</i>	0.110*** (0.020)			
<i>inter2</i>			0.110*** (0.024)	
<i>NQ</i>		0.893*** (0.338)		1.551** (0.6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可识别检验的P值	0.000		0.00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29.049 [16.380]		20.360 [16.380]	
Kleibergen-Paap LM 统计量	21.146***		24.105***	
样本量	510	510	510	510
\bar{R}^2		-0.132		-0.561

由表3可知,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两个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 且在1%水平上显著,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分别为29.049和20.360, 均远超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的临界值(16.380),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情形。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 且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 在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三) 稳健性检验^①

1. 考虑新质生产力稳外资效应的时滞特征

鉴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及其稳外资效应可能存在时滞, 如技术成果转化具有周期性, 本文采用滞后一期解释变量进行重新估计。

回归结果显示, 滞后一期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仍为正, 且在1%水平上显著, 估计值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新质生产力对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具有持续且稳健的促进效应,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期双向因果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2. 控制逆全球化趋势的外部冲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思潮蔓延, 这显著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为考察这些宏观外部冲击是否影响了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 本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 $Post2008$ (2009年及以后取值为1, 反之取值为0), 并构建其与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交互项, 纳入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而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仍为正, 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表明, 尽管面临逆全球化趋势的外部冲击, 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新动能, 其驱动作用具有显著的韧性与稳定性, 并未因外部环境恶化而发生结构性变化。

3. 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为克服单一指标测度可能存在的偏差并增强结论的普适性, 本文选取以下两个替代指标重新进行回归。其一,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 该指标将名义利用外资额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以2006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剔除价格因素, 并取自然对数。其二, 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 即当年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的户数取自然对数, 旨在从企业进入数量的维度衡量外资进入意愿。

回归结果显示, 无论采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还是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这一发现表明, 本文关于新质生产力促进外资流入的结论不依赖于特定指标的选择, 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基于城市微观面板数据的再检验

鉴于省级面板数据可能掩盖辖区内城市间的异质性, 进而引发加总偏差, 导致实证结果的精确度与解释力受限,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层级下沉至城市层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 本文选取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建面板数据,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在变量构造上, 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区域溢出特征及省级政策统筹属性, 本文将前文测算的省级新质生产力指数匹配至对应城市, 即同一省份内所有城市沿用该省份新质生产力指数。

回归结果显示, 即便在控制城市个体异质性后, 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仍为正, 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表明, 本文结论并未因数据加总层级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假说1在更微观的城市层面依然成立, 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①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 留存备索。

五、机制检验

为探究新质生产力增强区域对外资吸引力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如下机制检验模型：

$$M_{pt} = \rho_0 + \rho_1 NQ_{pt} + \nu Control_{pt} + \mu_p + \lambda_t + \varepsilon_{pt} \quad (12)$$

其中， M_{pt} 为机制变量，包括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具体而言，本文采用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TI1$ ）与技术市场成交额（ $TI2$ ）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采用低碳发展指数（ $lowcarbon1$ ）和碳排放强度（ $lowcarbon2$ ）作为绿色转型的代理变量。其余变量含义与式（11）相同。

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区域原始创新能力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并引致高素质人力资本集聚，从而有效减少跨国企业在技术搜寻与要素匹配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摩擦，提升其在东道国的技术获取效率与投资预期回报，进而增强区域引资吸引力。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617和2.041，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激发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内生活力，还通过提升高质量技术供给能力，促进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从而为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更具吸引力的技术生态与制度环境。假说2a得到验证。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绿色生产力，其内生发展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它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向低能耗、高附加值方向升级，加速能源体系由化石能源主导向清洁能源替代转型，从而系统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构建符合全球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准则的制度与生态基础。这一绿色制度环境不仅降低了跨国企业面临的环境合规成本与声誉风险，还契合具有绿色偏好的高质量外资对负责任投资的诉求，进而显著提升区域在全球绿色资本配置中的吸引力。绿色转型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如表4列（3）和列（4）所示：当以低碳发展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时，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为1.003，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以碳排放强度为被解释变量时，其估计系数为-0.063，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一“正向提升—负向抑制”的双向证据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有效促进了区域绿色能力建设，还切实遏制了碳排放的扩张趋势，体现出鲜明的“增绿降碳”协同效应。可见，新质生产力通过重塑区域绿色竞争力，营造与国际可持续投资标准接轨的营商环境，为吸引环境敏感型、长期导向型的高质量跨国资本提供了坚实支撑。假说2b得到验证。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TI1$	$TI2$	$lowcarbon1$	$lowcarbon2$
NQ	0.617** (0.252)	2.041** (0.774)	1.003*** (0.291)	-0.063** (0.0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7.417 (10.319)	-14.722 (12.415)	-3.563 (8.726)	2.662*** (0.864)
样本量	510	510	510	510
\bar{R}^2	0.704	0.772	0.943	0.975

六、异质性分析

（一）区域异质性

鉴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考察新质生产力稳外资效

应的区域异质性。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列(1)至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存在明显的“东强西弱”梯度差异。具体而言,在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345,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该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能有效转化为外资吸引力;而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上述区域目前尚未显现出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梯度差异,红利释放呈现“东强西弱”的非均衡特征。其深层机理在于要素禀赋与制度环境的非对称性。东部地区凭借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与市场化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了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溢出,从而形成显著的引资集聚效应;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受制于产业基础薄弱、开放度不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等因素,新质生产力难以有效转化为比较优势。

表5 区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1)	(2)	(3)	(4)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NQ	0.354* (0.185)	0.088 (0.122)	0.113 (0.100)	-0.147 (0.0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4.336** (7.855)	-0.597 (0.779)	-0.145 (0.698)	3.439 (1.623)
样本量	170	102	187	51
\bar{R}^2	0.506	0.792	0.460	0.904

(二) 数字普惠金融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低成本、广覆盖、高触达”的特征,能够有效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金融服务门槛,进而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包容性动力。理论上,完善的数字金融生态能够加速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深度融合,从而强化其稳外资效应。为此,本文依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将样本划分为高数字普惠金融和低数字普惠金融两组进行回归。数字普惠金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金融门槛效应”:在高数字普惠金融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282,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发达的数字金融环境有效畅通了技术转化为资本的渠道;而在低数字普惠金融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26,但不显著,意味着滞后的金融配套体系抑制了新质生产力潜能的释放。

(三) 制度环境异质性

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高度依赖制度环境的支撑。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规则体系与降低交易成本,构成了技术要素流动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而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稳外资效应的边界条件。借鉴卓乘风和毛艳华^[49]、戴翔等^[50]的方法,本文以制度型开放水平作为制度环境的替代变量,按其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制度型开放和低制度型开放两组进行回归。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高制度型开放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337,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优越的制度环境,如高效的政府治理、透明的规则体系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从而增强其稳外资效应。相比之下,在低制度型开放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09,但不显著,这意味着若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难以转化为引资优势,未能发挥稳外资效应。

表6 数字普惠金融、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1)	(2)	(3)	(4)
	高数字普惠金融	低数字普惠金融	高制度型开放	低制度型开放
<i>NQ</i>	0.282** (0.097)	0.026 (0.061)	0.337*** (0.097)	-0.009 (0.0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1.414* (11.090)	0.964 (1.165)	-26.458** (9.594)	1.042 (1.043)
样本量	255	255	255	255
\bar{R}^2	0.482	0.592	0.522	0.818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6—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自主构建的新质生产力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外资吸引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能够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吸引外资的两条关键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梯度差异和环境门槛特征，即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仅发生在东部地区，且该效应高度依赖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制度型环境的协同支撑，仅在高水平环境下得以充分释放。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梯度培育机制，打造区域协同新格局。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稳外资效应，应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东部地区应利用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建设新质生产力示范区。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核心城市布局量子计算、空天信息等前沿产业，将其打造为全球技术转化的关键枢纽。同时，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试行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制度，力争在三年内推动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显著增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应实施“新质生产力追赶工程”，在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建设10个国家绿色技术创新中心，配套实施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力争在五年内培育一批省级智能工厂标杆。此外，应高度重视跨区域协同合作，构建“东数西算”产业协作带，打造京津冀—雄安、长三角—皖江、粤港澳—广西三条科创走廊。建立跨区域技术交易市场联盟，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重点产业园区全面实施。

第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激活技术创新动能。首先，强化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在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关键领域部署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并适当提高中央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比例。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对成功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的团队给予薪酬与荣誉激励。其次，促进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与应用。建设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推广“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模式，为中小微企业购买高校专利提供“首购首用”补贴。最后，优化人才引进与培养体系。实施“新质工匠培育工程”，在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建立顶尖科学家“绿卡直通车”制度，进行技术移民积分评估试点，促进高端人才规模稳步扩大。

第三，深化绿色转型，塑造竞争新优势。首先，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制定新质生产力绿色标准体系，严格执行新建项目碳排放强度准入标准，并推动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实施碳效评价管理制度，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其次，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发行专项债券支持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设立国家级气候投融资基金。推广“碳账户与绿色信贷”联动机制，对绿色转型标杆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并实行担保费率减半政策。最

后,拓展绿色国际合作网络。加快建设上海国际碳金融中心,承办全球绿色投资峰会。建设“一带一路”绿色技术合作平台,力争扩大绿色技术出口规模。

第四,优化制度型开放环境,筑牢引资新基石。首先,推动规则对接。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率先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高标准经贸规则,并建立健全跨境数据流动安全评估体系。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落实“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制度,吸引亚太地区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其次,提高服务效能。构建“一网通办+AI客服”智慧政务系统,显著提升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网办率。建立外资企业诉求响应全天候机制,最大限度缩短投诉处理时限。最后,加强要素保障。探索实施新型产业用地政策,创新“标准地+承诺制”供地模式,大幅压缩重点项目审批与建设周期。

参考文献:

- [1] 戴翔.数字经济下全球要素分工新趋势、新挑战及中国开放新举措[J].天津社会科学,2025(5):104-111.
- [2] 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6):127-145.
- [3] 张林,蒲清平.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6):137-148.
- [4] 蒋永穆,乔张媛.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4(1):10-18+211.
- [5]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175.
- [6]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 [7] 曾立,谢鹏俊.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经济纵横,2023(12):29-37.
- [8]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经济纵横,2023(12):20-28.
- [9] 任保平,王子月.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6):23-30.
- [10] 沈坤荣,金童谣,赵倩.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24(1):37-42.
- [11] 戴翔.数字化转型与循环经济协同创新:理论、机制及路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7-79.
- [12] 周向雯.营商环境视角下外资企业市场退出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对896家在华外资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实证[J].产经评论,2020,11(5):42-60.
- [13] FILIPE J A, FERREIRA M A M, COELHO M P, et al. FDI political risks: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test trend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 sciences, 2012, 2(2): 117-124.
- [14] TATE W L, ELLRAM L M, SCHOENHERR T, et al. Global competitive conditions driving the manufacturing location decision [J]. Business horizons, 2014, 57(3): 381-390.
- [15] 李燕,陆帆,李志聪,等.税收营商环境的“稳外资”效应——兼论政策协同的影响[J].财政研究,2024(6):54-70.
- [16] DAI L, EDEN L, BEAMISH P W. Place, space, and geographical exposure: foreign subsidiary survival in conflict zon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3, 44(6): 554-578.
- [17] JULIO B, YOON Y. Policy uncertainty, irreversibility, and cross-border flows of capital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3(C): 13-26.
- [18] LUO C Y, SI C X, ZHANG H Y. Moving out of China?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J]. Economic modelling, 2022, 110: 105826.
- [19] 郭平,胡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23(2):34-49+134-135.
- [20] 葛顺奇,李三川,罗伟.贸易脱钩、关税冲击与外商撤资[J].国际贸易问题,2024(3):50-68.

- [21] 洪俊杰,杨志浩,商辉.国际供应链供给冲击与中国“稳外资”目标——外商资本追加视角[J].经济科学,2021(6):5-20.
- [22] 严兵,贾辉辉.工业用地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与外商撤资[J].世界经济研究,2022(3):92-108+136.
- [23] 李磊,马欢.从“生产回岸”谈“稳外资”——基于发达国家机器人使用驱动的分析[J].管理世界,2023,39(10):41-59.
- [24] KRENZ A, PRETTNER K, STRULIK H. Robots, reshoring, and the lot of low-skilled worker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36: 103744.
- [25] 赵晓阳,衣长军,郭敏敏.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稳外资”?[J].经济评论,2023(2):31-42.
- [26] 綦建红,周泓竹.机器人应用与“稳外资”[J].世界经济,2024,47(8):3-36
- [27] BELDERBOS R A, ZOU J. Foreign investment, divestment and relocation by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East Asia[J]. Asian economic journal, 2006, 20(1): 1-27.
- [28] BERRY H. Why do firms divest?[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21(2): 380-396.
- [29] RASCIUTE S, DOWNWARD P. Explaining variability in the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s of MNEs: an exploration of country, industry and firm effect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4): 605-613.
- [30] 李磊,王小霞,蒋殿春,等.中国最低工资上升是否导致了外资撤离[J].世界经济,2019,42(8):97-120.
- [31] 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经济学动态,2024(1):3-11.
- [32] 任保平.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经济研究,2024,59(3):12-19.
- [33] 潘春阳,吴柏钧.从“硬环境”到“软实力”:人力资本吸引FDI效应的实证研究[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9,26(1):70-84.
- [34] 郑栅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4(4):1-2.
- [35]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59(3):4-11.
- [36] 戴翔,张二震.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与路径[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4):124-133.
- [37] 王珏,王荣基.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与时空演进[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1):31-47.
- [38] 戴翔,成鹏东.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型效应:理论阐释与多维实证[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1(3):125-144.
- [39] 韩文龙,张瑞生,赵峰.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6):5-25.
- [40] 蔡跃洲,牛新星.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及结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1(11):4-30+204.
- [41] 许宪春,雷泽坤,胡亚茹.中国数据资本形成总额与数据资本存量测算[J].经济研究,2025,60(3):54-68.
- [42] CALDERÓN J B S, RASSIER D G. Valuing the U.S. data economy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nd online job postings [C]//BASU S, ELDRIDGE L, HALTIWANGER J, et al. Technology,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245-284.
- [43]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 [44] 曹薇,赵伟,司玉静.数字经济对低碳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J].软科学,2023,37(9):47-54.
- [45] 方慧,赵胜立,吕静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高了城市FDI效率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7):124-142.
- [46] 戴翔,马皓巍.制度创新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了吗[J].国际贸易问题,2024(1):16-31.
- [47]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 [48] 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49] 卓乘风,毛艳华.制度型开放与城市经济韧性[J].国际贸易问题,2023(4):1-17.
- [50] 戴翔,成鹏东,张二震.中国省级制度型开放水平测度及演变特征[J].政治经济学季刊,2025,4(2):116-161.

From Factor Dividends to Productivity Dividends: The Reshaping Mechanis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tractive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DAI Xiang, REN Yijie, CHENG Pengdong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Summa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stability, exploring whether and how these forces can reshape China's attractiveness to foreign investment through factor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structural restructuring, thereby transitioning from "factor dividends" to "productivity dividends". Based 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e paper transcends conventional "factor determinism" by categorizing labor into traditional and digital labor, capital into physical and data capital, and innovatively measures provincial-leve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dice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methodologies.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ree key findings.

Firs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foreign investment stabil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ccounting for time lags, excluding anti-globalization interference, and conducting robustness tests. Second, the mechanism verification confirms a dual-path mediating effe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ot only elevate factor endowments through technological leaps but also align with global green investment trends via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r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s pronounced. Eastern regions demonstrate varying marginal effec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foreign investment stability due to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industrial synergy advantag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level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ree trade pilot zones.

Compared to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three key contributions. First,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t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factor determinism" by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ctor upgrading, spatial restructuring, green development",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by whic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hape foreign investment attractiveness. Second, methodologically, it pioneers the integration of entropy analysis with the transcendental log production function to measure provinci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dices, providing a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ird,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situates the "stab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issue within the strategic context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structuring, exploring a symbiotic path betwee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b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but also inspires new ideas and provides differentiated policy toolbox for how to better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stab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reconstruct new 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realize high-quality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ab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een transition

(责任编辑: 邓 菁)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4.008

[引用格式]戴翔,任祎婕,成鹏东.从要素红利到生产力红利——新质生产力对外资吸引力的重塑机制[J].财经问题研究,2026(4):103-117.